

屏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总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委员会 编

645350

207/13
屏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总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本輯責任編輯：陈善斌

編輯：叢華西 牟本乾 梁順銘 陈濟洲

屏山文史資料

第 二 輯

（总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屏山县印刷厂印制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內 部 資 料 ）

目 录

深切的怀念 不懈的寻找

- 悼念叔父凌则之烈士……………凌之衡 (1)
- 李宗煌同志的一生……………民革成员 赵玉君 (6)
- “民革”烈士李宗煌事略……………黄佩钟 (14)
- 我所知道的李宗煌烈士……………朱培东 (16)

- 我的家——地下党的联络站……………冉永淳 (19)
- 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工作和成长……………齐国英 (34)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宜宾

- 屏山大逮捕回忆……………齐国材 (39)
- 一九四七年屏山大逮捕……………牟本乾 (46)
- 对一九四七年屏山大逮捕我所知
的一点情况……………包琴躬 (50)

屏山县“国大代表”竞选期间

- 五花八门……………黄佩钟 (52)
- 一九四七年“省参议员”何霁光
竞选屏山“国大代表”情况……………李炳堃 (56)

来信摘登：

- “池鱼思故渊”……………聂仰华 (59)

漫谈雷马屏第二边区医疗队·····	朱祖云	(62)
屏山县幼稚园创办史略·····	宋开新	(63)
锦屏杂志 (一) ·····	陈善斌	(64)
解放前屏山教师的“六腊战争” ·····	李品铤	(71)
民生公司“民同”轮遇险记·····	宋开鑫	(72)
反对盐商垄断食盐·····	余启彬	(73)
中都、新市镇雹灾耳闻目睹记·····	巫锡乾	(74)
三十年代中都水火灾见闻·····	罗声望	(76)
大乘场镇的来历·····	萧国忠	(78)
大乘地区农民暴动概况 ——“白莲教”打团防局·····	陈廷枢	(79)
鸭池乡丛话·····	黄宏发	(81)
龙华燕子孔探奇·····	周定鑫	(83)
屏山古景杂咏 (七律四首) ·····	聂华西	(85)
红梅新赞 (七言叙事诗) ——悼张露萍等红岩七烈士·····	张泽霖	(87)

深切的怀念 不懈的寻找

——悼叔父凌则之烈士

凌 之 彻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同志来信，转来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的电话：“凌则之（松如）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离‘清华’到太原参加‘牺盟会’。一九三七年组织‘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凌则之首先参加，任指导员，后任团政治处主任，决死一纵队三总队政委。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后，一纵队改编时，他担任二十五团政委。参加百团大战，在关家嘴战斗中牺牲。当时评价他为英勇的共产党员。”薄老还说：“我对凌则之记得很清楚，这样一个英勇牺牲的好同志，竟至今找不着下落，太不应该了！我可以证明。”

我捧着这封革命长辈充满了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和对我们后代殷切关怀的信，情不自禁，眼泪夺眶而出。在交织着敬仰、怀念、感激、悲痛的心情中，往事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一九三九年秋，我刚满六周岁时，父亲辞去了从事十余年的乡村小学教育工作，出外谋生，临行前一天对我说：“你的四爸（即凌则之烈士）是一九三三年阴历七月初十日你出世第三天离家去北平的。你是难产儿，你母亲临产时，四爸为你母子的安全，白天奔走求医，整整三个夜晚守候在你

母亲的房门前。……”父亲又带我到楼上一间小屋子里，打开几口装满书籍的大箱子说：“这就是你四爸去北平前读过的书。你公公去世时他只有七岁，少年时没有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机会，他十八岁（即一九二九年秋）才考进叙联中初中（现宜宾一中），读了一学期即去成都。一九三零年秋，用我的初中毕业证书，考进成都联中高中（现石室中学）。从那时起，他在外改用我（凌松如）的名字。”父亲一席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热爱叔父、要像叔父那样读书的种子。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欢呼声中，当时在成都任银行职员父亲，带我到中山公园东侧的一家照像馆，指着橱窗内一张戴八角帽的军人照片对我说：“他就是毛泽东，你四爸离开清华大学，就是到他管的地方参加抗日决死队的！”

解放后不久，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从地方到部队，又由部队转回地方，每次写自传或填写如“干部登记表”之类，都认真地写上：“我的叔父凌季虞（又名凌松如），是在‘一二·九’运动后，于一九三六年离开北平清华大学参加抗日的……请组织帮助查询。”同时，自一九五一年函请当时西南军区《人民战士》帮助查询叔父下落起，卅多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写了多少封求助信。得到的回音，多数是“无法查询”、“不了解”之类的令人沮丧的话。或者对方竟不予置理。后来，听说“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有部份学生加入了新四军，有可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于是我给中央军委写信求助。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部用双挂号信回复：“凌之彻同志：七月十二日军委办公厅转来你关于请求帮助查询叔父凌松如同志情

况的信。接信后，我们由有关部门查询了现存的皖南事变前后的有关材料，没有查找到关于凌松如同志的情况。”尽管这仍然是一封查无结果的信，但它是党的军事首脑机关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例证，它给了我这个尚待查证的烈士亲属以希望，使我更加相信党不会忘记为拯救祖国和解放人民而献身的死难烈士们！

由于历史原因，曾较长时间地冷漠了英雄烈士，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更被涂抹成一片漆黑，多少英烈被打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党的领导下，各有关方面都在积极抢救革命历史资料，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于是，我有较多的机会阅读有关怀念烈士的文章。十分有幸，终于在《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八月号《责任》一文中，读到革命前辈韦君宜同志的女儿对记者说的一段话：“母亲‘清华’时的同学凌松如，百团大战时当团长，为保卫八路军总部牺牲了。……”短短数语，令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噙着泪水，写信给韦老，介绍凌松如烈士的形象特征、性格特点和求学经过以及我与烈士的关系。信寄出不久，就得到韦老在百忙中寄来的回信，承认我是凌松如烈士的侄儿，告知凌松如到山西即改名为凌则之。同时，她为了使地方政府承认凌则之烈士是我们的亲人而多方操劳，特转来了薄老的上述电话。我们又收到党中央纪委书记李昌同志来信，证明“清华大学只有一个凌松如”。我们将薄老、李老、韦老关于凌则之烈士的谈话录音和信件，交给烈士的故乡——屏山县党和政府后，韦老又亲自去清华大学查档案，得到写有凌松如是四川省屏山县楼东场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寄到屏

山，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发文向宜宾地区行署报告，将凌则之烈士补编入《屏山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凌则之烈士是一九三四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三五年秋转读社会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走上抗日的革命大道，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伟大的、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后来，他加入了“民先队”，由于他对救亡工作认真负责，被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大队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和李昌等同志都是清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带头人。一九三六年四月，经李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抗日斗争中，凌则之烈士不愧为一个“英勇的共产党员”。正如烈士的母校——清华大学校党委写的《太行山下的忠魂，“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士凌则之》一文中说：“为了民族的解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凌则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不幸中弹，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这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刊登了智敏写的《悼凌则之同志》，报道了烈士殉国的事迹，称“他是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最好的模范”。

叔父积极热情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参加抗日决死队牺牲在太行山的消息，是当年在北平求学的我的堂兄凌之鸣于一九四三年告知父亲的。那时我还年幼，稍大后父亲才给我讲了些叔父在“一二·九”运动及其以后的点滴情况。其实叔父的英雄形象，早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就在我心中牢牢地树立起来了。

今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为了四化

大业，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和安宁，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已经或正在搜集整理载入史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邓力群同志在一九八三年“一二·九”纪念大会上说：“……要把他们的事迹搜集整理出来，在‘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北京香山桃花沟建立‘一二·九’纪念亭，永远纪念他们。”

凌则之烈士的献身精神，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将鼓舞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比先辈更加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在四化大业中大显身手的新一代青年！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

李宗煌同志的一生

民革成员 赵玉君

李宗煌同志，字仲华，屏山县中都区中都乡人，生于1899年，死难于1949年11月，终年四十九岁，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地下组织创始人之一。

父亲李植卿，石匠出身，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军功任汉军统领，先后兼任四川广汉、犍为、资中县知事。家乡革命志士舒兴福、施焕文都曾是他的部属。

宗煌早年在宜宾旧制中学读书，后又入川军刘文辉所办的军官传习所第一期，毕业后，在刘部历任排、连、营、团长等职。1932年军阀混战后，改隶川军刘湘部。1937年调任少将副旅长，鉴于旧军中派系之争，辞不就职，寓居成都。抗战军兴后，川康綏靖主任邓锡侯聘为少将参军，亦未就任。他从亲身经历的军阀混战中，对民生疾苦体会极深，常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宗煌性豪爽，肝胆照人，仗义广交游，对朋辈和家乡有志青年，凡有乞助，无不慷慨应之，故颇获时誉。如中都青年朱仕俊，在“九一八”事变后，有志抗日救国，宗煌资助他入广西南宁军校。抗日军兴，朱在桂军中任营长，最后为国捐躯。屏山同乡祝荫隆（建封）曾与刘伯承将军早年在川军中共事，任过团长，系中共地下党员，与宗煌极为友善。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相约去苏联学习，后因军职在身，未果

斗。祝荫隆同志离川去苏时，寄妻托子。宗煌厚赠路资，壮其行色。在祝去后，每月资助其家属费用二十元（我同他曾去看望过），直至祝妻离开成都（她亦系中共地下党员）失掉联系而止。

宗煌同志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随二十四军驻防彭山、眉山时，先后援救过一些革命青年，如彭山罗毅文、眉山张某某（据鹿佑珣同志称：此事是他牵线搭桥的，鹿是宗煌的老朋友）。张系中共地下党员，因投奔眉山友人处避难，不幸被当地驻军高育琮旅逮捕，严刑逼供，动用背“火背篋”等酷刑，张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身份。宗煌同志通过该旅军法官，将张保释，而张受伤严重，家贫无力医治。宗煌又为张筹备医药费大洋二百元，送至成都四圣祠医院治疗半年，张愈后犹留下满背疤痕——也给反动派留下了千古罪证。

1944年，宗煌与杜重石等同志发起创办了《大义周刊》社，王伯与同志是发行人，杜重石同志任社长，张瀚、谢无量、彭光汉诸先生列名发起人，撰稿人有杨伯恺、沈志远、张友渔、洪钟、邓初民等诸先生。《大义周刊》的宗旨是：贬责恶势力，宣传革命真理。不久，被反动派勒令停刊。

宗煌同志生性倔强，不畏权贵。在旧社会里，军政界人们争权夺利，丑态百出，他所不耻。并曾幻想凭借“袍哥”力量，利用其“豪侠仗义”一面，转化其封建性的涣散、破坏性一面。因此，他对“袍界”要求团结一致。希望通过严密组织，改造“袍哥”烟匪相联的恶习。所以他后来参加“民革”活动，在策反工作中，联系了不少“袍泽”中“知

名人士”，以增加助力。

1939年，家兄赵迪德由美归国来蓉，黄慕颜同志拟约宗煌“出山”组织抗日队伍，请家兄劝说（黄、赵系讲武学堂同学、好友），我也从中鼓励。他婉言解释说：“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决不能再做国民党的工具。”

1947年，蒋介石为挽救颓局，伪装“民主选举”，妄图欺骗人民。宗煌以“选民提名”当选为屏山县“国大代表”，以为通过民主手段，可以改革弊政。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值程潜在竞选“副总统”中居于劣势，但程非蒋系，又因与先父赵熙是旧友，故宗煌支持程潜。及程因受反动派压力而宣布放弃竞选时，宗煌同志始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争夺权位的丑剧，遂暗约相好的“代表”弃权（不投票）送川。不久，南京汇来“代表”应得费用“法币”二千多元，宗煌同志不要，立即将汇款通知退回银行。其时，我们在经济上也很拮据。

1948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与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取得联系。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蒋政权的忠实爪牙，对刘防范甚严。刘不便开展活动，将实际领导责任交由宗煌同志负责，担任民革川康分会执委兼组织处长及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刘文辉同志，化名“杨宗文”，宗煌同志化名“华正国”）。

同年冬，由杜重石同志带来了民革中央用蓝色油印的委任川康分会执行委员和民主联军川康军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文件。

由于地下组织初建，又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之中，党的统战政策分工和民革中央指示，均难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地方，

所以对当时的组织路线、任务，均不够明确，遂以组军为主要任务。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减少革命阻力，一开始就着重于对反动军队的策反和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工作，而发展成员也服从于这个目的。

当筹建之初，原川康分会各处人事均未配备齐全，而又急需人手工作，当时共同工作的同志多次建议备齐各处人员。宗煌同志一再向他们解释：“希望大家克服困难工作，应虚位待贤，如果名额配满，有忠于革命而具有才能之士参加，何以位置？我负重责，必要时也当让贤。”当他电约在澳门寓居的王蕴兹同志回川，即准备让其负军事全责，虽因多数同志以王不了解全面情况而未赞同，但仍交予在川西地区发展武装力量的军事重任，这说明他是言行一致的。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当然应不计较个人名位高低。但就民革地下组织创建之初，而当时又以发展国民党中上层为主要对象的组织路线，他这种让贤的思想和作风，不仅体现了公而无私的品德，也争取、团结了同志，加速了组织发展。

宗煌同志在发展组织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吸收革命青年。当时在成都的川大、华大、成华大学都发展了成员，还在川大建立了民革地下区分部。在学校及教、职员中、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党的统战政策的宣传，揭露反动派挑起战争和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阴谋，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如利用当时“民意代表联谊会”提出反对蒋介石在四川征粮征丁，反对王陵基助蒋为虐“剿匪戡乱”。编写了一些顺口溜、通俗诗句和传单、标语，如《反征丁征粮》、《四川人民要活命》等宣传品，大量刻印，派同志夜间贴在成都市主要街道，并邮寄各县“参议会”。反动当局

发现，十分惊慌。

这些青年中，王建功、（川大学生）黎一上、（军校学生）曹立中（原成华大学学生）等同志均在成都十二桥殉难，合葬于成都青羊宫烈士墓。这些同志，死者坚贞不屈，生者积极工作，是与他的影响分不开的。现在四川省、成都市工作的部份同志如朱戒吾、乔曾希、徐文同、赵念君等同志及已故的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交叉党员聂鑫同志，都是宗煌直接发展的。

随着斗争的开展，当时活动经费极感窘困，他为此百般筹措，甚至连一支自卫手枪，也打算卖充经费。有同志劝他必须留用自卫，他慷慨地回答：“革命成败不在于一支枪，更不在于个人的安危。”可见其忘我的政治远见。

1949年3月，宗煌同志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潜去重庆，洽购枪弹以充实武力，布置地方武装力量。那时他的外甥王蜀生（由宗煌同志抚育成人的），亦由福州调回川任七十二军少将副参谋长，他们约会于亲友家，亲亲之谊，情同“母”子。宗煌同志告诉他，“我已参加川康民革组织”，并说：“川康局势将有大的变化，胡宗南在西安蹲不下去了，还想退保四川，是保不住的。解放军不久会大举进川。你要机灵一点，不要那样死心塌地的！”其目的是要他做该军的策反工作。

同年3月下旬，郭汝瑰先生（七十二军军长）受命为“叙、泸警备司令”，宗煌同志即约蜀生来蓉，并对他说：“要你回成都来，主要想了解七十二军移驻川南后的警备部署情况，你要设法不伤害活动在川滇边区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部队和在雷、马、屏、峨地区与我联系的地方武装。七十

二军内部营连长中不少是我的旧部，我要注意抓部队，将来配合行动，迎接解放。”蜀生表示：“一定遵嘱行动。”

当时，曹立中联系在军校受训的民革地下同志，搞川西军用地图，被军校发觉，曹立中等同志被捕。军校校长关麟征在纪念周上叫嚷：“那些搞什么的公然搞到我军官学校来了，真是太放肆，非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可！”许多同志劝宗煌赶快离开成都，避一避风险。而宗煌同志毅然回答：“如果面临艰危，领导人就先撤离，势必涣散人心。只能提高警惕，镇静对待。”

1949年5月，因王蕴兹同志提前在川西崇宁起义，专人送信给他，宗煌同志于次日召开重要会议，部署全局配合问题，并决定其他同志先行撤离成都，他最后再走。

宗煌同志就在当天下午在君平街被数名特务逮捕，继经“国大联谊会”提出询问李宗煌代表“失踪”事。次日，成都各报刊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表谈话，大骂“国大代表”李宗煌“背叛党国”（参见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五五辑所载王陵基的自白罪行）。

宗煌同志最初被禁于纯化街四川省党部，由曹旷情等人以“友情”请他吃饭，企图软化他交代“民革”情况，遭他拒绝，并义正严词地说：“我没有做过出卖国家民族的事情，有什么交代、自白？你们要杀就杀！”之后，就转禁于将军衙门。在铁窗折磨的数月中，他经受了酷刑和利诱的交相摧残。在这期间，蜀生曾带领独子李致民两次前往探视，他每次与王见面，即先以目示意窗外有人窃听，要王讲话留心。他袒胸露臂，暗示他身上被严刑拷打的伤痕，蜀生见后凄然泪下，不忍卒睹。而宗煌同志则坦然地说：“我肯砍掉

脑袋，不愿割掉耳朵！你转告么舅（指赵念君）他们放心。你早点回七十二军准备应变，不必久留成都，好好照顾你的舅母和毛弟。”

宗煌同志被囚禁在成都的时候，承郭汝瑰先生派该军参谋长许某专程来蓉与王陵基等联系，要求将宗煌同志转交七十二军拘禁，但遭到王的拒绝。

1949年9月，反动派以“要犯”将他用飞机押解重庆，囚于老街“西南长官公署”。在重庆解放前夕，诈称将他转押昆明，提出监狱，壮烈牺牲。

1950年2月，重庆磁器口死难烈士善后委员会在民生路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杨虎城将军的次子杨大烈同志（当时任陕西大荔军分区副司令员）代表烈士家属致词，他说：“血海深仇，义无反顾，此仇不报，不共戴天！”表达了烈属们满腔悲愤的心情。当天印发的《纪念刊》上，亦刊载有宗煌同志死难的简明事迹。

同年2月，在成都文殊院举行李宗煌烈士追悼大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专送白绫悼词一幅，上书：

“浩然正气，至大至刚，杀身不屈，吾党之光。”

中共原川西区统战部领导人李宗林、熊扬、李杰村等同志亲临吊唁，赠送花圈。参加追悼会的有二百人以上，我们深切地感到“生荣死哀”——哀宗煌生之多艰！壮志未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同年，党和人民政府查证其壮烈殉国事迹，确定为“烈士”，由原川西行政公署发给烈属证；复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再度查其殉难事迹，列入重庆市殉难烈士的光荣榜上，为川康民革死难烈士五人之一，永志千秋。